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5.01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制度逻辑与实践路径

龚剑飞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77)

摘要: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内容,也是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并不断取得重大成就,开创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新型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新的发展阶段,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有效供给,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意识、涵养制度精神,培育良好制度生态。

关键词: 制度文明;制度建设;制度逻辑;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1)05-0090-10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②党中央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调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明确了新的战略目标任务。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在“全面”,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各领域,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是重要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如何持续巩固好制度优势,补齐制度短板,

增强制度弱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制度保障,是必须完成好的长期战略任务和回答好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制度逻辑及其重大意义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在地包含了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任何现代化都建立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现代化本身就是各种制度的产物之一。”^③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这一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收稿日期:2021-08-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KS066)

作者简介:龚剑飞(1974—),男,江西上饶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③杜玉华,俞佳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策略》,《学术研究》2020年第5期。

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一重大论断深刻阐明了我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一)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道路提供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自成立以来就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和全人类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主动担负起为人类发展做出历史贡献的使命和责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毛泽东同志就豪迈地向世界宣告:“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上,更体现在为人类贡献更好更优秀的制度文明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探索之路,邓小平同志豪情满怀地提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构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不懈探索,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矢志不渝地为人类制度文明做出积极贡献^③。

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普遍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社会危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高呼“我们在社会中占99%,不愿再忍受那1%的人的贪婪与腐败”,“占领华尔街”行动引爆全球,更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巴西人等也都“揭竿而起”。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而且使发展中国家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从表层原因来看,西方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归

咎于宽松管制;从深层次根源来看,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历史和现实表明,西方大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破产。面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深重危机,越来越多西方有识之士将之归结为政治制度和治理体制的弊端。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正是我们出现问题的法律和制度难辞其咎。西方经济大萧条不过是影响更为深远的西方社会大衰落的表象而已。”^④一些西方政要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模式,思考将政府调控与市场竞争、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公平进一步结合起来。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西方国家乃至全球引发的危机和失败表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弊端充分暴露,西方新自由主义并非人类通往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的不二选择。人类文明要实现真正的共同进步和繁荣,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本国的繁荣发展,必须打破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探索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

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人们将目光转向东方,寻找解决问题的中国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建立起扎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型国家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为我国创造“两大奇迹”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创造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新型制度。这一新型国家制度越来越被实践证明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造,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其他国家实施有效治理与高效治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珍贵的“中国礼物”。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57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③崔金奇,焦石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与世界意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④尼尔·弗格森:《西方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PXVII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二)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提供中国实践

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课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课题,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偏离社会主义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陷入低谷。西方世界欢呼雀跃,各种所谓的“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消亡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论调甚嚣尘上,其中又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他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视作“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挫折时,邓小平同志就充满信心地说:“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①社会主义承载着探索消灭剥削、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的人类理想和使命,共产主义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代表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尽管遭遇了挫折,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沿着西方设计的轨迹前行。中国共产党顶住了压力和挑战,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紧密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持续稳定的强劲表现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特别是成功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成果,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有力地展现了党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②。对于这种深刻转变,西方有识之士不乏清醒认识和理性前瞻。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说:“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这个更精彩的时代当然不会是福山所说的那种‘历史终结’的时代;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它至少是这样—一个时代,即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大文明形态的互较互竞、互学互鉴中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实现新的进步,而社会主义文明在其中会做出愈来愈大的贡献。”^③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使得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反而终结了“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走出了低谷,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了勃勃生机。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还将长期占据优势,资本主义社会仍将在很长的时期内“病而不倒”,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遏制、打压的态势仍将长期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必然要求我们始终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的社会主义。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明确宣告:“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⑤“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

①《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8页。

②颜晓峰:《胸怀“两个大局”的高远战略思维》,《光明日报》2019年7月29日。

③滕文生:《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④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了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世界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黑天鹅”乱飞,“灰犀牛”乱跑,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更是一场公平的“考试”,考验重大危机和挑战面前的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大考之下,“西方之乱”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千疮百孔,“中国之治”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重大疫情之下的中西制度比较,有力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科学预见:“可以预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将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②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就会始终屹立不倒。

(三)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这一伟大飞跃,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为实现第二个伟大飞跃提供根本制度保障。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③。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的道路上仍然面临

不少困难和挑战,对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需要治理体系更加完善,需要治理能力与时俱进不断提高。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是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这条伟大的复兴之路凝练概括为新“两步走”。第一步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要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内容看,新“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包括了完善制度和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在时间节点和目标要求上都与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高度契合,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战略安排的具体化发展。这不仅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容,而且拓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二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不断取得重大成就,开创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新型制度,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

(一)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1页。

^②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③岳伟,鲍宗豪:《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现代化的历程、成就及启示》,《企业经济》2019年第10期。

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的完善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并及时对成功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和理论提升,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系统理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治理现代化问题,既是对党和人民长期探索科学制度体系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制度建设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的概括和提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提出“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命题,这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制度理论的重大课题。围绕这一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地阐释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系包括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概念,如首次全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的经验总结,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提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强调在制度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等等。在推进治理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系统思维的高度提出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要求。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理论体系。一种制度要长期保持优势,还需要对不断发展的制度进行理论总结,持续提升制度的阐释力、说服力、吸引力、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理论渊源、领导力量、依靠力量、重大原

则、发展规律、制度精神、制度执行、制度创新、制度生态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逻辑关系,治理能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关系,治理能力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关系,以及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实践基础、社会功能、建设路径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和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二)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丰厚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①这一重要论断阐述了“两大奇迹”的实践基础和制度因素,是制度自信的活力源泉。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管用又有效^②。这“两大奇迹”,既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胜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蔓延,并快速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更加坚定了让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信心和决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涉险滩、闯新路,开启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的高效性。在经济方面,我国在2010年就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

①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②王新建,池忠军:《论新时代的“两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江淮论坛》2020年第2期。

界首位;在人民生活方面,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对世界经济贡献方面,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动力最充足的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14年蝉联第一;我国经济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台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等等,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尼尔·弗格森写道,在亚当·斯密时代,中国正处于长期的“停滞静止状态”:这个一度曾经繁荣富强的国度就这么停下了发展的脚步。而时至今日,如果斯密能够旧地重游,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经济史的发展真好似风水轮流转: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而出现经济僵化、止步不前的正是西方国家^①。几十年来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中国的优异表现使西方“崩溃论”一次次“崩溃”。综合国力更强、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国际地位更高,意味着国家和人民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影响力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去支撑高水平的治理^②。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两大奇迹”是党执政70多年治理成效的标志性成就,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一个快速发展的落后经济体通常伴随着社会的不稳定,发展中的国家必然具有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冲突的过程。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提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③社会动荡不安,不仅无法顺利进行改革和建设,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毁掉,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还会危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确实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发展中国家之路到底该怎么走,如何避开发展道路上各种各样的“陷阱”,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前提性认识就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三者关系中,稳定是“压舱石”,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只有社会稳定,

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承受度协调统一起来,确保改革发展不以牺牲社会政治稳定为代价,以改革发展实现社会稳定,以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发展。由此,我国不仅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实现了长期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成为一张靓丽的名片。群众对社会发展安心、放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所以人们会说,“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证。中国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不断与时俱进的治理能力,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人民幸福、民族团结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牢固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70多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70多年,也是制度建设和探索的70多年。70多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勇于实践、接力奋斗,持续探索和完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为建设最好的制度不断巩固坚实的基础。早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就把完成全国革命形象地比喻为“铲地基”,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比喻为“起房子”。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国体,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政体,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顶层制度设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时代性、开创性,建构了共和国制度大厦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

^①尼尔·弗格森:《西方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PXVII页。

^②马希:《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指向》,《湖湘论坛》2020年第4期。

^③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开放历史新时期,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建设的需要,并要求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的发表,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新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那以后,党领导人民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为目标,不断探索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军事外交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在发展中深化改革,以体制机制的改革探索,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制度体系,极大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总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国家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明显提高,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主要是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改进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发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综合改革,建立国家监察制度,等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为完善和发展制度体系框定了正确方向,为新时代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 推进制度建设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70年多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制度探索和实践,取得制度建设和治理的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同时也要看到,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中还有不少“空白点”和“薄弱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许多不足”和“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暴露了不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和短板,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大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完善力度,补齐短板、增强弱项。

(一) 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形成系统成熟、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①推进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加大改革力度,坚持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部署推进制度建设。“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既是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下一步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必须牢牢坚持的原则问题和努力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了制度体系的基本架构。

根本制度是制度体系这座大厦的“根基”,在制度体系中起着“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必须牢牢坚持、毫不动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明确了“五大根本制度”,即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文化制度、根本社会治理制度、根本军事制度。这些根本制度,是定方向、管根本、谋长远的制度,是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在制度上的具体表现,必须牢牢坚持和巩固,否则就会动摇根本,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五大根本制度”,是对“坚持和巩固什么”的有力回答,更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

基本制度是制度体系这座大厦的“柱子”,管的是国家基本形态和运行,要坚持好,更要完善好。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基本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充实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三

^①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大基本政治制度。同时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制度在制度体系中具有枢纽作用,连接根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构成制度体系的重要支撑。与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不同,在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之前加上一个“等”字,表明基本经济制度会随着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而扩充。基本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执政能力的与时俱进。

重要制度是制度体系这座大厦的“梁檩”,需要建立健全、完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制度学理论的角度来说,一定的制度是特定时代条件的产物,总是适应一定时期的特定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形势变化和实践发展,一些具体制度会出现与形势变化和实践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之处,这就要求对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①,是制度体系创新、完善、发展空间最大的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②,通过在实际中的反复摸索,把适合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使我们的制度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和澎湃的动力,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

对制度体系从不同层面明确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确定了层次分明、逻辑贯通、结构严密的制度架构。对制度体系的合理区分,既有利于保持制度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发展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必须瞄准各项具体的目标任务,抓住当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发展需要和发展趋势,深入解决与制度成熟定型和治理现代化不相符的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抓

紧建立尚未出台的缺位制度,特别是关系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为推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补齐制度短板。

(二)运用“破”“立”辩证法,抓住制度建设的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③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运用“破”和“立”的辩证法,阐明了新时代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为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

“破”和“立”,是推进治理的一体两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所侧重、有所区别,是治理规律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对“破”和“立”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④“在中央制定并正式公布新的制度和条例以前,有关各方面的工作,仍照现行制度办事。”^⑤在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上,邓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有力推进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经验,把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特点新内涵,充分运用“破”和“立”的辩证法,逐步确立“不立不破、先立后破”的重要原则,把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工作做在前面,并以此革除旧弊、打破陈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了总体目标,部署了战略任务,吹响了奋进号角。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牢牢抓住制度建设这根主线不动摇,确保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2019年,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了重大成果,进一步

^①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6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7—68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增强了全党的理想信念、强化了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锤炼了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真刀真枪解决了一些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形成制度,为党的建设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三) 抓住关键少数,培育良好制度生态

形成好的制度既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也就是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生态、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制度氛围。良好的制度生态包括自觉的制度意识、刚性的制度权威、严格的制度执行。制定制度——执行制度——完善制度——执行制度——更高水平的制度,制度建设呈螺旋式上升、递进式前进,形成开放式的闭环,构筑制度建设的良好生态系统,使制度在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培育良好的制度生态,要抓住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以“关键少数”带动全社会的“大多数”。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晏子春秋》说:“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古人的治理智慧告诉我们,只有执政者、领导者带头遵守法令制度,以身作则,才能带动全社会遵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①。如今40多年过去了,这五个弊端有的已经得到有效解决,有的得到很大改观,有的还需要加大力气革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度弊端,必须从思想意识上着手,从解决“不敢”到“不能”的问题,再到解决“不想”的问题。当前,一些干部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特权意识、特殊心态,在遵守制度、执行制度上未能做到“率先垂范”。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针对性的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②党员、干部要自觉维护制度权威,增强制度执行力,带头遵守制度、敬畏

制度、执行制度,把对制度的敬畏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自觉行动,始终做到在制度的框架范围内修身养性、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

培育良好的制度生态,要在全社会涵养制度意识。制度既是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也是内在的文化思维价值认同。形成良好的制度生态,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从思维观念上下功夫,在全社会涵养制度意识,让制度意识扎根民众内心,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所谓制度意识,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是对制度的认同和遵守,是习惯于在制度规则内行事的共识。人是制度的主体,培育制度意识,关键在于培育人的制度自信和制度意识。只有制度自信和制度意识在每个人心中都生根发芽,全社会才能形成人人尊崇制度、人人维护制度的浓厚氛围,好的制度生态就会逐渐形成。要在全社会开展制度教育,把制度教育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过程。通过制度教育,把制度自信和制度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人们在遵守和执行制度时投入情感和动力,发自内心对制度保持敬畏,不踩制度红线、不越雷池半步,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形成人人遵守制度、人人维护制度的氛围。

培育良好的制度生态,要强化制度执行,提高制度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铁一般的制度,还要有铁一般的执行。制度最终要靠人来执行和遵守,有了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再好的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也会成为摆设,流于形式。严格制度的执行,防止出现“破窗效应”。压缩制度执行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压缩制度的自由裁量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③总书记在这里提出了制度执行力的概念,为制度执行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制度执行力就是制度主体贯彻落实制度的力度、效率、质量,强化制度执行,要在提高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有学者认为,理想的制度执行具备系统完整、内容全面、对象精准、资源高效、力道充要、无负面后果等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6页。

^③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特征,缺损这些特征的制度执行都是有问题的^①。强化制度执行,要建立一个严格制度执行的督查体系,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防止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走样变形、变通打折。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执行问责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不力的问责力度。要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理论研究,丰富制度执行的知识体系和经验智慧。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把推进制度和治理体系自身变革放在突出位置,解决好制度供给滞后于制度需求的问题,解决好制度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脱节的矛盾,进一步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中国之治”。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GONG Jian-fei

(Research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iangxi Academic of Social Sciences, Nanchang 330077, China)

Abstract: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the basic content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institution and governance, creating a new i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ory, practice and institution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o promote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reform and innovation, adhere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increas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institution and governance system, build a complet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system with effective operation, strengthen the system consciousness, cultivate the system spirit, and cultivate a good system ecology.

Key words: institution civilizati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logic;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李春成:《强化制度执行需要破除哪些障碍》,《国家治理》2019年第46期。